

# 从“独语”到“对话”

——论中国当代民族文学获取在场性谈论的资格

[中] 涂 鸿\*·王 进\*\*

## 目 次

- 一、“独语”文学是自在自为的民族文学言说方式的存在形态
- 二、只要有文化接触就有文化移动和文化交流的历史景观
- 三、民族文学精神建构既充分体现独语文学又充分体现对话文学

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马克思、恩格斯<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开放，西方异域的现代主义文艺

\*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2信箱 教授, tuhongk@yahoo.com.cn

\*\*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2信箱 副教授, w.jj123@163.com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犹太裔德国人，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理论家。主要著作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最为人知的哲学理论是他对于人类历史进程中阶级斗争的分析。他认为这几千年来，人类发展史上最大矛盾与问题就在于不同阶级的利益掠夺与斗争。依据历史唯物论，马克思大胆的假设，资本主义终将被共产主义取代。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德国社会主义理论家及作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主要著作有《德意志意识形态》、《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

思潮，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而且也对相对较为封闭并有着自己独立的文化形态和存在状态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少数民族作家与诗人，他们在具有本民族浓厚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关照下，吸收了许多具有现代艺术特征的表现手法，并与他们那种相对于多数汉族作家与诗人而言，更加贴近自然，更加贴近生命本真的创作心理相交融，形成了他们文学创作一个独特的艺术视域。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纳，这是一次比20世纪80年代中国汉族文学创作在西方文艺思潮影响下的现代化，意义更为深远的交融。因为这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接受外来文艺思潮的影响，而改变自己传统诗学观的滥觞。

中国的民族地区是相对封闭和神秘的区域。对这一区域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外来文化和思潮的影响下，所产生的现代意识进行分析、追寻与研究，这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而且具有人类学的意义。

因此我们应从世界文学的格局中来考察中国当代民族文学所作出的选择。

中国当代民族文学在世界语境的生存背景之下，既有“独语”形态，又有“对话”形态，而且对峙中的这两种形态都是不可省略的必然存在事实。

### 一、“独语”文学是自在自为的民族文学言说方式的存在形态

这里的“独语”，并非局限于个体的言说方式，而是指内倾语境的民族言说行为，它包括语言本体的孤独、话题的孤独与话语氛围的孤独。

就语言本体的独语特性而言，一些人总认为特定的母语历史，构成语言品种的根性固执和表达优势。就话题的独语特性而言，一般认为民族的现实生存话题或者文学话题，未必都是其它民族正在关注或者有兴趣关注的焦点，但同时它对民族自身的当下演进而言，又具有其别无选择性，民族因此而应说和能说，却始终还只不过是自说。就话语氛围的独语特性而言，往往呈现出“被抛

弃”的压迫感和“被冷漠”的压抑感，因为从公正性原则持议，所谓世界语境无疑应该是集体性在场，由此而形成语种文化间的公共性谈论氛围。然而，这终究只是理想主义的学理设定，几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有某一种或某几种语种文化的暂时缺席。

如果我们把世界文学同步地理解为与世界语境相一致的存在空间的话，那么总是会有一种或几种民族文学，在特定时间位置离开世界文学的言说空间，彼此不相粘连甚至隔膜不入。如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以蒙古族的马拉沁夫、赛音朝克图、赫哲族的乌·白辛、壮族的陆地、韦其麟、维吾尔族的乌铁库尔、傣族的康朗英等为代表的创作，算得上一个巨大的作品存在空间，他们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主义时期新生活的不同体裁作品，这意味着民族文学的言谈欲望和谈论兴趣都非常强烈，并在一定程度上坚守了民族言说方式的独立完整性。但国门打开以后，当中国的少数民族的精神生活随汉族一起也切入到世界性生存方式之中的时候，并且当中国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也试图以转变后的姿态，参加到世界文学在场交谈语境的时候，它就常常只能充当静静倾听的孤独者角色，同时在那种氛围的笼罩之中却又几乎难以进入，他一方面难以进入世界文学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又脱离了民族的文化 and 历史，在本民族文化语境中失语，如蒙古族的马拉沁夫、土家族的冉庄、纳西族的木丽春、仡佬族的包玉堂等人。独语语境的存在，并非与封闭或开放成直接正例关系，即使在世界交往频繁和世界文化融合的时代，独语依然存在，而且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其合法性体现为：

其一，某种文化的生存内涵与言说方式，总有其自在和自为的方面，而一切自在自为的内容，实际上并不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实现跨文化效果，也就是难以或者根本不可能与别文化参与者之间建构起“说——听”在场性关系，所以一切“说”就都只能是独语，更通俗地说是“自言自语”。

其二，若从长远的人类命运看各民族的文化利益带有终极一致性，然而这丝毫不能排斥现实利益的单位切分，也诱导着世界各民族的命名欲望和言说欲望，以确保现实过程中“倡”者的中心强势。于是在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学的在场

性参与语境中，所有主体自律性强的民族都会选取这样一种姿态，一方面努力去对话，并在这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吸纳人类实际进展中的文化能量，另一方面而始终会表现出自我回避的隐私心理，以维护自身的原创文化优势，之所以在交往的情境下，仍然会形成“不能对话”的民族选择意愿，一种原因在于民族自我中心偏见，在以己族之主观态度观察及衡量一切事物的态度下，认为自己在言说之际不必委曲求全地求取对话位置或对话方式。

其三、除非持一种极端理想主义的观点，否则谁也不会认为世界语境就是纯洁而且富有谈论效果的精神共在家园，进入世界语境亦未必就能实现有效的言说或者富有吸纳意义的倾听，语境本身更大程度上只能是“杂然共在”，而且“噪声”现象尤其不可低估。于此情势之下民族主义者就会清醒地作出判断和选择，决定自己是否加入到对话的行列中去，由此就有“不必要对话”的缺席态度。

既然存在着独语语境，也就有与之相吻合的独语文学，它是一种自在自为的民族文学言说方式的存在形态，在“风格”持论里，理论家们把民族文学的生存独特性更多地归诸其外部形态，譬如前苏联文艺理论家波斯彼洛夫认为：“法国古典主义，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和俄国的浪漫主义，都具有多样的体系，而其中的每种艺术体系都有或多或少的风格上的差别”<sup>2)</sup>实际上，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风格差别都不是民族文学存在形态的本质边界。在“自弃”持论里，作家们容易为文学的滞后寻找到符合日常心态的托辞和开脱。在无限地夸大独语合法性的同时，培植起“吾即世界，世界即吾”的夜郎情绪，消解甚至无视世界的价值转换与价值判断的共约性的一面。于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与作品，便因此而得以意义升值，并且在这种升值的自娱行为过程中，悄悄地关上了文化互化与文学交流的大门，并最终程度不同地窒息文学发展的生命力。

所以独语文学乃是民族暂时离开交谈语境后的自我精神反思，或者是一种孤独与压抑。民族文学理所当然地要在世界情境中出场，并以热烈的姿态同其

2) 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王忠琪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5，P.410.

它母语文学交谈、交流、交汇直至交换，有如个体之必须经常保持对群体公共活动的参与态度。但是，民族文学也不得不时时退场，冷静地回到自己栖居的家园。

对民族而言，任何一个拥有独立母语系统的民族，不仅有个性之思，而且有个性之言，尽管它会不断地从异域借取“词”或“说法”但却更主要地依凭着自身的“基本词”或“基本说法”，由此而有民族文学得以独立完整的边界，方使一种民族文学本质性地区分于另外一种民族文学，独语文学是民族文学无法逃脱的存在形态。

## 二、只要有文化接触就有文化移动和文化交流的历史景观

在现代生存情境里，人们一般就对话文化的认识似乎更加清晰，在交往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完全不成其为问题的前提下，剩下的问题就只是“如何交往”的疑虑，除非在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情绪里，否则“对话”都是进入现代生存的一种基本态度，这具体表现为：

其一，当一种民族文化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意欲进入世界化情境，与别的民族文化进行对话时，必然有其目的性支配着这种愿望和具体实施行为。这种目的性将会明显地表现在，“说什么”与“怎么说”，“获得什么”与“怎么获得”，双方有哪些谈趣与如何确保倾谈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sup>3)</sup>，这也就是说，文化交往的前提是文化交往者的能量生成，而作为交往之一种形态的对话，更应该从一开始就处于自律控制之下，由此确立其交往双方的意义指向。

其二，民族是否获得独立的精神主体性，这是决定其与异城文化交往过程中能否获得公正性利益的直接前提，因而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关系，必然是公正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P.24.

性背景下，两种文化间保持各自主体独立的一种谈论情境。如藏族作家阿来对象征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的接受，回族作家张承志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对存在主义与象征主义的接受，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保伍拉且，藏族诗人列美平措、唯色，白族诗人栗原小荻等，任何形态的文化交流过程，唯有在不同的独立主体间进行，方能确保其公正性秩序，才能在不同的文化言说者之间形成富有建设意义的对话关系结构，彼此间才能达成一种互动。

其三，不同民族文化间之所以有对话的欲望和要求，乃是因为彼此都相信有一种人类主潮文化方向，制约和牵引着不同文化形态的充分发展，于是，每当时空移位之际，就常常会有主潮迷失的幻觉，也就迫使各方都要去寻找自己的“言谈合作者”商议未来性的主潮文化指向以及当下性的主潮文化建设。所以，一种文化以积极的姿态加入到某种对话语境，必须在进入之前就已经抱定一些“文化主旨”(Cultural theme)，即“一些具有相对性的统一标准”<sup>4)</sup>并根据这些标准设计出公共言说空间，尔后展开其进入姿态，充分地言说抑或充分地倾听，随时地会意抑或随时地争执。总之，当我们迈入对话之途，必先审视是否有支配言说情境的某些主旨，同时还要反思这些主旨是否在价值维度上具有主潮文化指向。除此之外，还得要充分考虑进入双方或多方的对话条件。

在粗略地分析了“对话”作为一种文化交流形态的三个限定性条件之后，我们大致可以获得这样一个学理性轮廓，那就是，只要有文化接触，也就有文化移动和文化交流的历史景观。虽然对话存在于这一景观之中，然而却是具有严格限制意义的发生过程，可以说是文化交流的高级形态和最积极方式。基于这样的印象，我们也就可以循此线索去把握这一文化语境中的对话文学，因为既然有对话文化，也就有对话文学。那么，民族在对话文学中，将会怎样去拓展其文学生存空间呢？

首先，是对生存的共同关注。尽管从初民文学开始，各民族文学就不自觉地表现出了相同的关注一致性，但是由于各民族的具体生存境况差异，特别是由于人类与自然的抗衡关系一直处于低级阶段和分散状态，所以生存共同关注

4) M.E. Opler, Rejoined to R. Cohe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LII. P. 43

的界面和深度，就都难以凸现到文学问题的中心位置。但是，随着20世纪世界文化语境和世界生存格局的根本性变化，公共生存症结迫使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同时给予应对，应对的态度、阐释的意义生成及其所采取的操作措施等，可能会彼此有异，然而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谁也无法逃脱一系列的生存性“遭遇”和“面对”。

人们通过文本的在场性对话，表现出各自对特定遭遇的关注热情，表明其对普遍性栖居之难的解困责任，如蒙古族郭雪波、满都麦、敖·奇达那日，土家族苦金、陈川，回族霍达的小说、白族栗原小荻的诗与戏剧。总而言之，现实的共同困境和形势使然的共同关注，是导致对话文学日益拓展和强大的坚实基础，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发展方向。如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时间》道出了这种心声：

在我的故乡  
我无法见证  
一道土墙的全部历史  
那是因为在—个瞬间  
我无法亲历  
—粒尘埃  
从诞生到死亡的过程  
哦，时间！  
是谁用无形的剪刀  
在距离和速度的平台  
把你剪成了碎片  
——吉狄马加的《时间》

几乎在吉狄马加的整体诗歌创作中，从民族与个体的书写到对地域和民族的超越，从来没有放弃吸收外来文化的影响，他以开放兼容的心态，虚怀若谷的借鉴，使自己在学习、交流和对话中走向更加丰富与成熟，同时他也将这些感悟化为了自己诗歌创作时的一种新的参照。

其次，是言说的话语相互转换。所谓“相互转换”，其实就是文化学意义上的“文化互化”(Transculturation)，即由各民族创造的文明成果，在横向移动中，被别的民族所接受和承享，甚至直接升华为世界文化情境中的“共同的财产”。而所谓“言说的相互转换”，在此只是指代这种移动现象在文学领域中的表现，意即各民族的文学成就，从作家到作品，从人物形象到故事情节，从语词到体式，从精神思潮到美学风格，都有可能转移到别的民族文学乃至整个精神生存空间中，并转型为其自身的说法或样子，内在精神或外部形态。如在创作领域，海明威小说中的硬汉形象影响了诸多语言背景的文学创作，并且可在其中找到它的影子和相似的声音。如回族张承志、蒙古族郭雪波、苗族、覃志扬、赵朝龙、石定的小说等。

在第一个层面，我们可看到各民族文学通过母语内部的代言人，把那些异域文学进展中的概念和命题，想法和说法，用母语的表达方式予以呈现，进而使母语文学背景进入到这些问题的商谈境况中去，形成其特有的观点和态度，最终也就使世界语境中增加了对某个话题感兴趣的新的言说者。

在第二个层面，“接受”乃是民族文学站在倾听位置，充当在场性谈论的被动角色，然而这种被动并不具有消极意义，它是倾听与言说相互位置转换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与此对应，“传播”显然是指民族文学站在言说的位置，它在努力推进自己的文化扩散和文学异域阅读，充当在场性谈论的主动角色，然而这种主动并不意味着必然性和持续性。实际上，对绝大多数现代民族而言，其在世界语境中，总是既站在接受位置又站在传播位置，既倾听又发言，既内纳又外扩，如中国的藏族、蒙古族、苗族文学表现得十分典型。

### 三、民族文学精神建构既充分体现独语文学又充分体现对话文学

既然民族文学在世界语境的生存背景之下，既有独语形态，又有对话形态，而且对峙中的这两种形态都是不可省略的必然存在事实，那么，当一种民

族文学努力想建构其当代民族文学精神时，究竟依靠何者为其基点？在独语论者看来，民族古典主义的旗帜亘古不倒，历史的承续之维决不能在当代被我们粗暴地缜断，民族文学要想获得独立价值形态，真正为异域文学所不敢低估或不能吞噬，唯一的出路就在于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寻求自娱性的“特色”、“风格个性”和“文化意蕴风貌”，如张承志、扎西达娃、阿来、乌热尔图的小说，吉狄马加、栗原小狄、伊丹才让、哥布等人的诗。

而在对话论者看来，当下的世界语境已迫使民族古典退场，民族文学要想取得在场性地参与谈论的资格，成为异域阅读的选择对象，必须义无反顾地追求世界精神，世界精神就是当代民族文学精神建构的最高取向。这种见解，最具冲击力的地方，就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滞后世界文学水平的原因追究和结果指责。在彼此不愿退让的情势之下，迫使我们寻找第三种说法，并且这种说法务必能够打通独语和对话间的话语生存障碍，从而使民族文学精神建构既充分地体现于独语文学，亦充分地体现于对话文学。

按照笔者的理解，这种说法暂且可以表述为“分工优势论”，也就是说，中国民族文学曾经有过它的辉煌历史，造就出了一批批具有世界文学价值的作家和作品，沈从文、张承志、扎西达娃、席慕容、阿来、霍达、乌热尔图等，这此作家作品所呈献出的人类意义生成，代表着人类当时普遍状态的先锋位置和利益尺度，而且在当下仍然没有失却其表达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如扎西达娃的小说对民族文学精神的建构既充分地体现了一种独语文学，又充分地体现了对话文学的特征：

这些景致并非在秘鲁安第斯山脉下的中部高原，而是在西藏南部的帕布乃冈山区。我记不清是梦中见过还是亲身去过。记不清了。我去过的地方太多。直到后来某一天我真正来到帕布乃冈山区，才知道存留在我记忆中的帕布乃冈只是一幅康斯太勃笔下的十九世纪优美的田园风景画。

虽然还是宁静的山区，但这里的人们正悄悄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

这里有座小型民航站，每星期有五班直升飞机定期开往城里。附近有一座太阳能发电站。在哲鲁村口自动加油站旁的一家小餐厅里，与我同桌的是一位喋喋不休的大胡子，他是城里一家名气很大的“喜马拉雅运输公司”的董事长，在全西藏第一个拥有德国进口的大型集装箱车队。我去访问当地一家地毯厂时，里面的设计人员正使用电脑程序设计图案。地面卫星接收站播放着五个频道，每天向观众提供三十八小时的电视节目。

不管现代的物质文明怎样迫使人们从传统的观念意识中解放出来，帕布乃冈山区的人们，自身总还残留着某种古老的表达方式，获得农业博士学位的村长与我交谈时，嘴里不时抽着冷气，用舌头弹出“罗罗”的谦卑的应声。人们有事相求时，照样竖起拇指摇晃着，一连吐出七八个“咕叽咕叽”的哀求。一些老人们对待远方的城里人，仍旧脱下帽子捧在怀中站到一旁表示真诚的敬意。虽然多年前国家早已统一了计量法，这里的人们表示长度时还是伸直一条用胳膊，另一手掌横砍在胳膊的手腕、小臂、肘部直到肩膀上。

——扎西达娃《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我们透过这些神奇虚幻的故事，不难看出它的寓意的所在。这个“魂”虽难于把握，但这是一个民族心理的负载，一个生死攸关的时代象征。只要联系西藏今天的现实生活与其往昔发展的历史，就会理解小说中人物各自神秘的象征意义。苦修者塔贝在活佛的指引下执着地寻觅通往“人间净土”的道路，尽管他已走得精疲力尽，仍对理想国坚信不移，直到死于喀隆雪山，成为传统观念的牺牲品。琼则是个盲从者，既渴望离开“毫无生气的土地”，又不知道出路在那里，只好跟着塔贝盲目寻求。“甲”村的现代文明与世俗欢乐使她从愚昧中苏醒，终于留下来开始新的生活。两个人物的不同经历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在西藏的现实生活中，既有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又有传统宗教意识的根深蒂固，作家通过“独语”到“对话”的思考，从而构成了对这块神奇土地旧的观念形态与现代物质文明不协调的独特矛盾思考。

当世界在目前的语境下需要寻找这类母题的表达角色时，曾经拥有历史言说贯性的文学，当然就处于最佳分工位置，从而既代表民族亦代表世界的延伸

其文学叙事历程。分工的优势还表现在，除了已知的世界话题和已然言说优势之外，对于未知的世界话题和未然的言说潜力，实际上也隐然存在于汉语文学现代转型的个性生存方式之中，它在新的世界语境中，面对新的世界生存格局和母题叙述空间，因其现代个性的独立品格而获得新的世界分工。并且同样会在新的分工使命中，形成具有当代性的独语文学和对话文学，在独语文学中承诺着拯救世界孤危的使命，在对话文学中承诺着拯救世界灾难的责任，所以是双向的价值承诺和效益发挥。在分工论者看来，民族文学对世界文学的价值逼近和意义敞开，将必须经过三个递进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确保历史优势，这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承认历史，而且更要清醒地把握住历史的个中真委，有效地坚持和发展民族文学的既有成果，切切不可盲目地走向民族文学虚无和文学现代言说的西方转向，在自暴自弃或惊慌失措中牺牲于各种设定的世界神话。

第二个层次是积极追求世界在场状态，这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要努力完成已经获得的文明工程成就，同时还要到世界的文化建设市场去主动投标，从而获得民族文学延伸和拓展的历史机遇，既大胆地参与讨论那些我们非常陌生或尚无生存关切的“世界关注”，在以倾听为主言说为辅的在场姿态中，保持民族文学的出席积极性，切切不可幼稚地走向民族文学至上和文学现代言说的古典复归，在夜郎自大和固步自封中牺牲给各种臆想的民族寓言。

第三个层次是充分表现出民族文学的言说冲动情绪和世界在场的发言亢奋状态，这也就是说，经过较长时间的文明积累和几代人的踏踏实实耕耘，在一系列的世界互约场合，我们都能够富有先锋意味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和呈现出富有异域阅读魅力的“说法”。因为那时候我们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以及在关于此问题的文学陈述方式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发言权，在独语和对话中都能形上性地说出让世界瞩目的“价值”和“意义”。

就当下整个中国文学的语境而言，文学渐呈多元多向的立体趋势，也为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进行多方面尝试的条件和可能，民族性在作品中更深层的表现成了少数民族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必然的首选。于是，他们不再是模仿和追随

他民族的作家而使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也不再是去为某种理论疲于奔命，而是更多更自觉地去了解和认识自己的民族。一个民族作家，只要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自己民族的精神实质，那么他的作品将是跨民族跨国界的，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有普遍意义的。

## 参考文献

- 马学良、梁庭望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 安纳·杰弗森等著《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和比较》，陈昭金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 涂鸿《“法规”之外的艺术突围——中国当代民族作家现代主义书写的语言范式》  
成都，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05期
- 涂鸿《超越传统中的诗性追寻——论重庆当代民族文学创作的言说方式》北京，  
《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 02期
- 钱中文《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 荣格：《心理类型》（C.G.Jung《The Psychology of Individuation》），吴康、  
丁传林、赵善华译，台北，桂冠图书出版，1999
- 梁庭望、张公谨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8
- Jacqueline De Weever, *Mythmaking and Metaphor in Black Woman's Fiction*,  
New York, 1992
- 茨维坦·托多罗夫选编《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Abstract〉

From monologue to dialogue

— On the Qualification of Presence Talking gained by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Ethnic Literature

Tu Hong · Wang Jin

Most ethnic regions in China are relatively self-enclosing and mysterious. But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ideologies since 1980s has had an immense influence not only on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Han, but also the ethnic literature, which is relatively self-enclosing and has its own independent culture and existence. Surviving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world context, the ethnic literature has monologue type as well as dialogue type, and both of which are the necessary reality which can not be omitted in their confrontation. The national classic has been forced to exeunt in the world context. The spirit of World ideology is that which the ethnic literature must pursuit without hesitation if it want to gain the qualification of presence talking and be chosen to read by the foreign lands. The world ideology is the highest orientation of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ethnic literature. Chinese Ethnic Literature, the first time ever foreign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Wes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consciousness produced by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and thereby demonstrate that they possess the unique character of literature and art as well as their unique position art of communication, will be a very meaningful.

Key Words : foreign culture, ethnic literature, presence talking

투 고 일 : 2010. 5. 10. / 심사 일 : 2010. 5. 20. ~ 2010. 6. 10. / 게재 확정일 : 2010. 6. 15.